

钟楼街史话之

千年街史略钩沉

从寿宁寺到打钟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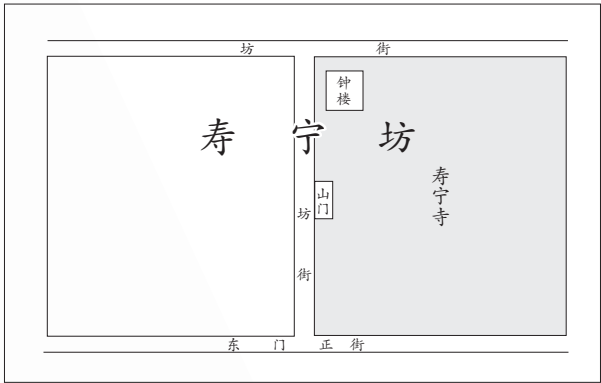
王继祖 王 琛

东门正街上的寿宁坊,与东门正街同时建竣于宋太平兴国七年(982)。从《永乐大典·太原府》中可以看到,被大火烧掉的北汉都城,创建于北齐的“十二院”之院名,全部移植到了东门正街两侧的新建坊间中,还有当初唐明镇上的寺院也麇集于此。其他搁过,我们仅说寿宁坊中的寿宁寺。

寿宁坊中的寿宁寺

寿宁坊是东门正街最有名的坊,坐落在东门正街最西头北侧,坊门开在东门正街上。《元一统志》便载:“寿宁院(寺),在府寿宁坊街东。”东门正街是东西走向,只能有街北、街南之分,而寿宁坊的坊街将寿宁坊分为东、西两片,说明此坊街是南北走向,坊是以北为上,坊门自然是坐北朝南开在官街北侧无疑。

寿宁坊建坊于太平兴国七年,公元982年,而坊中的寿宁寺,创建时间却是七年之后的端拱二年,公元989年,其寺额的书撰年代以及今虽不存在却有志乘所载的“端拱中建院碑”,都是最好的证明。过往有些志乘、史籍说寿宁寺创建于“大中祥符四年”“大中祥符八年”“大中祥符年间”或失之粗枝大叶,将真



宋代寿宁寺在寿宁坊中位置示意图

寿宁寺之俗称“打钟寺”

为什么要把寿宁寺俗称为打钟寺呢?个中理由也不一般。自古以来,沙门寺院计时告众,均为钟、鼓二物,所谓晨钟暮鼓,最初便出自于寺而不是市井,也不在宫廷。寺庙幽深,纪律森严,晚击鼓,早撞钟,以报时间指导或指挥僧众精进修持,功课作业,才能寺规模持,秩序井然。试问哪座寺庙无钟楼?哪座寺庙不敲钟?把寺宇中撞钟的常规推理为寺庙之俗称的来源,是合乎事物发展的逻辑?还是合乎沙门礼仪?回答均是肯定的!有悖常理的!但太原的寿宁寺,就产生了这个有违常理的俗名“打钟寺”。

违背常理的,往往难以维持其生存;不合乎逻辑的,往往难以被认同,很容易在时间的拷问中被忘却,被淘汰。但是,寿宁寺这个看似不合乎逻辑、有悖常理的俗称“打钟寺”,却是穿越了历史的时空,既没有被淘汰,也没有被忘却,一直流传到如今。再早的不说,就类似我这样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同龄的太原人,或较长时间生活于太原的外籍人,在时间、环境的濡染下,凡涉及这个名称时,都是直呼“打钟寺”或者“打中市”,而不是“大钟寺”“大中市”。“打”是上声,用“v”表示,“大”是去声,用“^”表示。这不是无病呻吟,也不是闲下扯篇,而是要弄清楚一个太原钟楼街上的历史过往,探索一下街史发展上的一个短板,“金元时期”的东门正街发生过哪些曾经有过、却没有史载存录的遗憾;要钩沉出史上既有,却在传承中失却的、被遗忘的史实。

现存的太原府、县地方志乘中,有不少关于“鼓楼”的记载,《永

乐大典·太原府》在记录子城时,曾有一段文字:“南门有‘河东军’额,因唐旧也,鼓角刻漏在焉,民间谓之‘鼓角楼’。”这个鼓角楼在子城什么地方呢?在其南城牆的北侧,“揀马厅”之东,“司录厅”之西,“右狱”之南,名字叫做“譙楼”,民间叫它“鼓角楼”。何谓“譙楼”?《三国志·吴志》说得明白:“诏诸郡县治城郭,起譙楼,穿堑发渠,以备盗贼。”可见,早在三国时代,东吴皇家便颁诏于国内,要求郡县治所在的城郭,建譙楼,配譙鼓,挖堑护城河,以备在盗贼和外敌侵扰城池时,登上譙楼瞭敌,敲响譙鼓告之,组织有效的对抗和防御。这个譙楼在宋时名称未变,再往后则更名为“鼓楼”,建址也从城垣移到了城中,它原本是鼓楼的“先祖”。

宋太原城中有“鼓楼”,史乘留下了这鲜见的一笔,但翻阅诸多史料,却没有见到关于钟楼的点滴记载。或许,钟楼原本就不是与鼓匹配的产物,而是后来城市发展需要的完善和补充。还有一种可能,那就是钟楼最初是佛家寺庙的产物,最晚在唐代的沙门寺庙中,已经有了放置钟的专门建筑,以利于钟之高悬,按时辰敲响,指导僧侣和善男信女的佛事活动。寺庙的高墙是隔不断钟声的,宏亮的钟声客观上为寺庙环周所居的民众,发出了规律的时间报导,时日既久,钟声影响和指导了人民的作息、劳动,逐渐

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依托。唐代天宝年间的进士,著名的盛唐诗人张继,有一首很有名的诗,叫做《枫桥夜泊》,其中的“姑苏城外寒山寺,夜半钟声到客船”,便是寺庙钟声对周围环境和生民产生影响最好、最生动、最形象的写照。

由彼及此,宋太原城中,不仅有见载史册的“譙楼”,也会有史册中无载的钟楼,作为宋、金、元时代太原城中名声颇大的佛家寺宇寿宁寺,难道会没有钟楼,钟楼所发出的钟声不仅会夜半传入城中百姓家,白日又何尝不是。时日一久,城中民居百姓、商家士绅,甚至至于官府衙门,都无法例外地受着其寺其钟声的波及和影响,按着它的时刻去作息,去活动,逐渐成为不能超脱的依赖。这种闻钟而动的举城行为,自然会产其该有的名称或称谓,于是,寿宁寺的钟一打,钟声便引导着民生的活动。于是“打钟”之称油然而生,“打钟寺”之名脱口而出,就这样在潜移默化中、约定俗成中,“寿宁寺”,这个充满吉祥雅训的寺名,渐渐淡出人们的口呼脑记,而“打钟寺”这个俗称,却与人们的现实生活水乳交融,代代继承。渐渐地,“寿宁寺”成了史册记载中的专用名称,而“打钟寺”却演变为城中妇孺皆知的寺名。就如同,太原人知道哪儿是“水西门”“旱西门”,谁还记得“振武门”“阜成门”!都知道“大北门”“小北门”,哪还能想到“镇远门”“拱极门”。

古寺终于完成了它从正名寿宁寺到俗称打钟寺的沿革和嬗变,并随着打钟寺名日益深入人心,寿宁寺名自然而然地渐渐淡出太原人的使用和记忆。这种此消彼长的“蝶变”还告诉后人,当年

宗立《太宗御书颂碑》的年代,误作寿宁寺的创建年代,或没有读到原书,以他人讹记为本,以讹传讹(详说见后文)。

当初的寿宁寺并不是并州太原城中名声最为显赫的沙门佛寺,而是规模并不太大的寿宁广化院,只是后来不知何故引起了赵官家的重视,太宗皇帝亲赐皇家图书于寺中。对此,地方志乘和相关书籍都有记载,而更为隆重的则是,太宗皇帝晏驾之后,其皇子真宗皇帝赵恒,亲自撰文为乃父歌功颂德,镌刻《太宗御书颂碑》立于寺中。于是寿宁寺名声日大,地位日尊。而真宗所制之碑一

直流传下来,直到清末尚存,清人朱彝尊有专文作记(此是后话)。由于宋初的两位皇帝如此看重寿宁寺,所以在宋、金、元时代,寿宁寺较城中其他寺院被高看一等,并且在金朝天会年中还进行了修葺、重建,山门由西改置于南,以至于移建来的“十二院”、过往的“唐明寺”“观音院”等,早已遗址无存,而寿宁寺却一直传承保护了下来,直至明清时代仍是香火不息,衣钵承继。

述及寿宁寺,总是不能令人忘怀的是它的另一个俗名“打钟寺”。打钟寺之俗称产生于何时?志乘记载颇简,简到让人难以弄清其理究。明万历《太原府志·古迹》说:“寿宁寺,俗呼打钟寺。”明代修志者把此简记归类于“古迹”,明确告诉我们“打钟寺”之名是过往的古事。明之前的“古”范畴太大了,宋是古,金是古,元也是古,但是,应该不会包括明初,即万历之前的明代,因古人,尤其是明、清两代修志、作史,把本朝称为“国朝”,当不会称“古”,更不会将其列入“古迹”去记载。可见,寿宁寺俗称为打钟寺,最晚当在元代,亦或更早的金代。

其次,打钟寺之俗称,产生于明代之前,并不是明永乐八年。而且俗称之产生,不似正名之命名,立下而定,它需要在较长时间的传播中约定俗成。第三,也是较为重要的。寿宁寺中一直就有钟楼,而不是“明永乐八年建起一座钟楼”。即便有永乐八年建钟楼之事,也应该是“重建”“重修”,而不应该是“建起”,因为“建起”两字,与“重建”“重修”的词意相差甚远,容易给读者造成寿宁寺原来没有钟楼,直到永乐八年寺内才“建起”一座钟楼的误导。重读那段引文:“明永乐八年寺内建起一座钟楼,而俗呼为打钟寺了。”完全可以说,原作者就是要告诉读者,因为永乐八年寺内建起一座钟楼,所以产生了寿宁寺被“俗呼为打钟寺了”的结果。

本版示意图由作者提供
本版绘图:王斌礼

金代重建寿宁寺山门由西改建于南

